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第 191 期（总第 303 期） 2017 年 4 月 7 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jixz@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抓住经济社会转型机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为了实现这四个转型，在改革上，要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措施：

一、要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三个重点，一是从过去以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二是国有企业要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发展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员工持股包括核心层、骨干层、老员工持股，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有企业能够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的公司，只有员工持股，才能够使企业的管理层和老的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翁。大家同心协力把公司办好。如果这个公司办得好，股票就可以升值，大家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果这个公司倒闭了，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大家会拼了命地把公司搞好。这也是西方的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的一个诀窍，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要成为这样的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这样的改革方向，当然了，员工持股不是说人人有股，人人有股又成为全民主义了，一般来说，员工持股的比例以 30-40% 为宜，而且每年要评选优秀员工，只有优秀员工才有资格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可以对优秀员工奖励公司的入股权。这样员工既拿到了一份工资的收入，又拿到了一份股金分红的收入，有了这两份收入，使劳动者变成有产者，劳者有其股。劳动力才能够迅速地富裕起来，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二、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浙江的台州农民发明的，在乡镇企业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股份合作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重要的产权组织形式。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带队到浙江对他们所有的结构进行调研，我发现混合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是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一类产权组织形式。发展股份合作制国内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要数深圳的华为公司，华为公司有 17 万员工，现在有 7 万人入股。另一个是浙江的舜宇公司，公司的老板原来百分之百是个人股份，后来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发现财集中在他手里，积极性很难释放出来，后来他把股份分为骨干层、核心层、员工层持股，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所以他提出这个理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第三个案例是内蒙伊泰集团，现在在这个公司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应当不要强制，浙江民营企业 30% 是党员，这些党员入党的时候接受了党的教育，把这些股份合作制的好处通过引导、通过宣传，让他们向华为这些公司学习，实行股权适当分散，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改造为合作制的企业是有可能的。

三、赋予农民以土地财产权

农民对他的承包制、宅基地、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所有权归村集体，用益物权或者是财产权归农户。农户凭借对土地用益物权对土地进行抵押、担保、转让，可获得财产性收入。去年山东省有的县有了突破，一个县成立一个土地抵押贷款担保公司，银行以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为抵押，万一这个企业跑路了，不干了怎么做？有土地抵押的担保公司给收储，重新招标，选择新的接任者，这样银行无后顾之忧可以利用三块地抵押调拨银行的贷款。如果“十三五”时期，我们以农村的三块地为抵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 20 万亿元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城乡差距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 39 年，我们大的结构调整经历了 3 次，一是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崛起，把农产品供给的短

四、引导劳资分配的合理比例

华为公司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是 1:3, 1:3 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在发达国家可能是 3:1，按照这样的比例，我们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上个月我到华为探讨劳资比例，任正非给我介绍，一开始的时候，一年按股分红可以拿到上百万、几千万，这些人不愿意干活了，他说这样不对，要调整劳资分配的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特别是使新增的利润向第一线创造技术专利、创造劳动成果开拓市场的人倾斜，不断地调整，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2015 年，工资分配达到 1200，按资分配 400 亿，这样 7 万多名员工能够拿到 90 万。这样的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的公司基本接近了，有这样的收入水平可以招揽全世界优秀的人才进入这样的企业。根据斯蒂利兹披露，美国 1% 的人拿到新增收入的 91%，又有统计数据，美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2010 年的 40 年，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为资本和技术拥有者攫取，蓝领阶层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华为股权结构和劳资分配比例的突破性意义，在于破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所以，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当有更多的政治优势。

五、促进人才纵向流动

创造和维护人力资本均等发展的环境，需要做到以下方面：

一个三位一体的架构。

一是全面持续教育。现在我们有义务教育，这个要坚持，落到实处，对目前已有的义务教育水平要落实，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更为重要。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职业转换需要的培训更为重要。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三是全面促进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要重视纵向流动。

到 2020 年全面脱贫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别是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是一个底线。

首先，在扶贫的过程中，应该强调能力建设，使人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持续地走上提高收入的道路。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开放市场。

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看一看中国还有多少领域、多少行业，我们现在的竞争是不充分的，而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我们存在行政性的管制、行政性的垄断。把这些领域放开，就给大家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怎样进一步地放宽准入，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降成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三，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

首先是农民进城，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城里人也可以下乡，让他们也下乡，发挥他们的能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技术等各种各样的要素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实现城乡互动。

最后，促进人才纵向流动，特别是公务人员、国有企业进入公平透明的招考制度。

职业官员能不能搞旋转门，有的到点以后下来可以搞教育、研究或者是其他的事业，有的官员干上两届可以干别的，这样可以避免职业的固化。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到 2030 年如果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50% 那么社会就比较稳定了。现代化社会，包括经济发展也会具有相当稳定的基础。

编者按：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逆潮的严峻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的减少，是导致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进而形成全球化逆潮的重要原因。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又是坚定推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鉴于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于 2017 年 3 月 27—28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市中改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新动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 82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邀请来自中国、挪威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智库、企业、政府官员等围绕经济全球化逆潮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抓住经济社会转型机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推进的经济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要素结构上，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产业结构上，改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继续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三是在需求结构上，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局面，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四是在城乡结构上，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努力

■ 邵秉仁 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

中等收入人群必须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居所，其中稳定的居所至关重要。首先，当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大多数的白领和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一个稳定居所的时候，无论如何谈不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当前中国目前的现状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的白领按现在的收入水平买不起房。其次长期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在已经回不去农村的情况下，居无定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定要抑制当前的房地产泡沫。

当前房地产的泡沫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基本的矛盾没有处理好。一是加速发展的城镇化与现行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没有处理好；二是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与地区均衡发展和民众的诉求关系没有处理好。

针对于以上矛盾，提出以下四点措施：

第一，要打破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的格局，让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就是集体组织和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完全具备财产权性质。就是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上，一定要具有完全财产权的性质。也就是有投资权、抵押权、收益权和继承权。这样既可以农民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直接获得土地的收益，避免层层被盘剥，使农民变为真正的发展过程中的股东，享有长期的收益权。

第二，在规划当中要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土地供应成本。

首先，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储备为名大量囤积建设用地，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这些地既不建设也不开发，长期在那里荒芜。而农民已经失去了该片土地的使用权，获得了一定数目的土地补偿金，但是很快被挥霍掉。这种办法等于用政府储地为名减少土地的供应。其次，要重新划定粮食安全的土地红线。在新的形势下，要重新评估确定，根据新的形势要重新划定粮食安全的土地红线。同时，由于

要来源，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三是稳定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提高财产性收入。五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参加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 82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时表示，中国未来 5-10 年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到 50% 以上。

2016 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涌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因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催生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是重要因素，求解“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他分析，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结构变革的趋势性特点比较突出，制度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为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重要机遇。他分述三个理由：
一、“十三五”中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正在引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深刻改变就业结构与提升就业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不断扩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型”特点相当突出，并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及制造业服务化的快速发展，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新的空间。
三、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加快转型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其就业形态将日趋多元化，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据预测未来 5-10 年一部分农民和农民工有条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迟福林表示，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历史性机遇，要转变成为现实关键要尽快以财产权为重点调整利益

关系，扭转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些产业，当然不是污染产业。在调整经济布局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到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从而为这些现在库存比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研究宜居城市，使全国的城市能够都有均衡的发展，人口有合理的布局。

第四，要设置房地产税，包括土地交易税、房屋交易税、固定资产遗产税等，但是，这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办法补充政府放弃土地垄断所形成的财政收入，改变土地财政状况。

这需要一定合理设置税率，要免除低收入人群的税，降低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提高加大高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高收入人群大量的通过合理的避税免交或者是逃避了个人所得税，而真正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工薪阶层，这完全与税制的初衷相违背了。总之一句话，抑制当前房地产泡沫，健康发展房地产，让城市的大部分白领务工者都能够安居体面的生活，是巩固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衡量标准是动态变化的。特别是一个经济体里，如何正确地把握和其他非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动态调整变化里最实质性的问题。中等收入群体的形式壮大，与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社保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紧密和内在的联系，是一个社会走向成员稳定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催化剂。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和扩大。但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纠结与焦虑，收入“提低、扩中、限高”，如果处理不好，将加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

在财税制度改革中应构建“提低、扩中、限高”的基础性制度的长效调节机制。财税改革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基础、形成支柱的配套改革，其三大方面（预算、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具有有机联系，需整体把握。对于“提低、扩中、限高”的直接制度建设任务，首先要注意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养老还要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第二在税制改革方面，要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最后是在反贫困、救济抚恤和救灾体系机制方面。精准扶贫是一个供给侧理性管理典型的案例，是要在中国把现有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分析到到位以后，各自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能够达成时间表要求的解决方案。

对于以财税改革支持在配套改革中形成社会成员“纵向流动”的现代化制度机制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提出的编纂民法典、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和纠正错案冤案。

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地促进机会、规则、过程的公平。

三是，以教育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实质性地推进教育改革。

四是，以科技改革破解“官本位、行政化”改革，要解决激励和环境制度建设问题。

五是，人事制度改革破解“任人唯亲、人身依附”。

抑制房地产泡沫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邵秉仁 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

中等收入人群必须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居所，其中稳定的居所至关重要。首先，当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大多数的白领和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一个稳定居所的时候，无论如何谈不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当前中国目前的现状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的白领按现在的收入水平买不起房。其次长期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在已经回不去农村的情况下，居无定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定要抑制当前的房地产泡沫。

当前房地产的泡沫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基本的矛盾没有处理好。一是加速发展的城镇化与现行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没有处理好；二是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与地区均衡发展和民众的诉求关系没有处理好。

针对于以上矛盾，提出以下四点措施：

第一，要打破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的格局，让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就是集体组织和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完全具备财产权性质。

就是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上，一定要具有完全财产权的性质。也就是有投资权、抵押权、收益权和继承权。这样既可以农民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直接获得土地的收益，避免层层被盘剥，使农民变为真正的发展过程中的股东，享有长期的收益权。

第二，在规划当中要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土地供应成本。

首先，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储备为名大量囤积建设用地，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这些地既不建设也不开发，长期在那里荒芜。而农民已经失去了该片土地的使用权，获得了一定数目的土地补偿金，但是很快被挥霍掉。这种办法等于用政府储地为名减少土地的供应。其次，要重新划定粮食安全的土地红线。在新的形势下，要重新评估确定，根据新的形势要重新划定粮食安全的土地红线。同时，由于

预测：2025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超五成

“假定未来几年，居民的收入增长在 6.5% 的水平上，到 2020 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 43%，到 2025 年可以超过 50%。”3 月 27 日，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 82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介绍了该院最新的研究成果。

李实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来源是低收入人群，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第一，三大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一是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企业创新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实施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一是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二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将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

要来源，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三是稳定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提高财产性收入。五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参加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 82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时表示，中国未来 5-10 年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到 50% 以上。

2016 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涌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因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催生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是重要因素，求解“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他分析，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结构变革的趋势性特点比较突出，制度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为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重要机遇。他分述三个理由：

一、“十三五”中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正在引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深刻改变就业结构与提升就业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不断扩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型”特点相当突出，并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及制造业服务化的快速发展，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新的空间。

三、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加快转型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其就业形态将日趋多元化，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据预测未来 5-10 年一部分农民和农民工有条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迟福林表示，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历史性机遇，要转变成为现实关键要尽快以财产权为重点调整利益

关系，扭转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他分析，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表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宗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